

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



夏静 著

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

夏静
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学观念/夏静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9

ISBN 978-7-108-06071-6

I. ①中… II. ①夏…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论—研究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5463 号

责任编辑 成 华 刁俊娅

封面设计 米 兰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9.25

字 数 214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序

古人关于文学的种种见解，不管相同或互异，几乎都是围绕思想文化在当时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而发的，往往并非针对文学本身问题而提出的解答，因而常常具有丰厚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思辨以外的目的。在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期，巨大的思想传统作为先在之知识资源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文学思想的视野与方向，我们很难将文论的萌生与渐次成熟从具体历史语境中抽象出来。因此，通过分析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原初意义的语素，将古代文论中的范畴、命题回溯到其生成的原初历史文化语境中，将其从业已不断被阐释而形成的传统回复到其原生的批评意识中，发现其承流会变之轨迹，梳理其由本及末之源流，寻求以最微观单位诠释思想文化本源之可能性，从而更加充分地呈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是本书的目的。

本书研究的“文”“象”“气”“乐”“礼”“和”“参”“诚”“养”九个语素，既有实体性语素，也有功能性、关联性语素，在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上述每一个语素都具有复杂多面的意义关联与价值指向。古人围绕这些语素展开的意义建构，不止在于知识的建立，还在于价值的印证与信仰的确立，范围至广，

目 录

文	1
释“文”	3
“文”义衍生	7
“尚文”与教化	20
周文与文学价值观	30
象	37
“尚象”传统	39
“象喻”思维	46
“文源于象”	54
“以象比德”	59
作为元范畴的意象	64
气	71
释“气”	75
气学知识谱系	86
气之一体三相	93
孟子、曹丕、刘勰论气	96

影响至巨，因而得以深入研考。本书所论述内容，亦属前所未有，故特立此章，附于前章研究的基础之上，所用资料除前章之论，并参前贤今人不刊之论，以资同行专家同道者朋友之参考。

乐	109
释“乐”	112
乐教源流	115
乐教之为“六艺”先	125
乐教与中国文论的发生特征	135
礼	141
释“礼”	144
礼之宗教品格	152
“制礼作乐”“礼坏乐崩”“礼乐复兴”	163
礼教与中国文论的发生特征	175
和	185
释“和”	187
“尚和”思维	198
“中和”源流	209
“中和”与早期文学观念	219

参	229
作为问题的“惟人参之”	231
经典解释传统中的“参”	234
“参”的意义世界	241
 诚	 249
先秦子学的阐释	251
汉唐经学的阐释	256
宋明理学的阐释	260
“诚”的审美意蕴	266
 养	 273
在主体实践脉络中	276
在社会文化脉络中	279
在历史传统脉络中	283
养气与为文	287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文”处于人文知识系统结构的最基础层面，围绕此一维度敞开的语义关联和意义空间建构了一个宏大的知识谱系和思想场域，古代人文知识的大部分视野都不离其左右。“文”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性成为文学理论范畴构成的核心语素并生成古人谈文论艺的基本语式，与古代艺术传统尤其是文学思想中诸多范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联，孕育了古代文学及文论的知识维度、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影响到古人对于文学性质、特征、规律及其功能等根本问题的认识。我们结合文字考辨、考古材料及传世文献，从观念史角度考察“文”之本源意义和衍生意义，以期对“文”之意义脉络所构成的中国古代思想发生期的基本历史文化情景，进行一番知识学意义上的考察。

释“文”

“文”义梳理，近世以来学者多有论述。^① 根据考古学研究，“文”之渊源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余年的夏禹时代。在发现夏社痕迹的早期陶寺文化的陶背壶上，考古学家发现朱书的“文”字，并认为这个字与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

① 近世以来学者常常从“文”之内涵与“文”义演变规律两方面进行研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述，譬如〔日〕青木正儿著，隋树森译：《中国文学概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9页；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于民：《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3页；刘若愚著，田守真、饶曙光译：《中国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季镇淮：《来之文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2页。

的汉字属于同一个系统^①。根据早期文献如《史记·夏本纪》《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夏代始祖禹的名字为“文命”，两者之间当非偶然巧合，加之新出土西周青铜器豳公盨铭文的印证，我们有理由将夏代朱书“文”与禹名“文命”所体现的原始文德观念联系在一起考虑^②。从传世文献看，太古无文。如《墨子·辞过》：“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清……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③《庄子·缮性》：“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泉淳散朴……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④ 在古人的文化视野中，“文”的意识是伴随着先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丰富而逐渐清晰、抽象出来的。传统学者关于“文”的历史考辨与经验归纳，以及近代以来出土的大量考古文字资料，为我们多维度地理解与阐释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文”之本义，大约汉人就无法确知了。“文”字初始意义大约有两端。在甲骨文中，“文”的写法有两组：“𠂔”（乙三六一二）、“𠂔”（后二·一四·一三）、“𠂔”（前三·二三·一）和“𠂔”（甲三九四〇）、“𠂔”（乙六八二一反）、“𠂔”

① 相关论述，参见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② 冯时：《儒家道德思想源流考》，《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秋之卷。

③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卷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1—33页。

④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51—552页。

(京津二八三七)。^① 在金文中，“文”有八十多种写法，延续了以上甲骨文两组的差别并更加明显化，两组分别为“𠂔”（休盘）、“𠂔”（此簋）、“𠂔”（虢文公鼎）和“𠂔”（文能匍尊）、“𠂔”（利鼎）、“𠂔”（文公丁簋）、“𠂔”（引觥）。^②

以上甲骨文与金文前后两组字符代表了两组义项，前者是象形字符，显示了许慎“错画”之义，尔后引申出“痕迹”“纹路”“花纹”“文采”“文饰”“修饰”“文字”等义项。“错画”之说，源于《说文解字·文部》：“文，错画也，象交文。”段注：“错画者，交错之画也。《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造画者，文之本义，彰彰者，彰之本义，义不同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③ 由于“错画”这一路数符合古人对于天文、地文现象的思维习惯，因此可以有效地解释先秦典籍中很多用例，如解释自然现象，《易传·系辞下》“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④，《尚书·顾命》“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文贝仍几”^⑤；又如解释人文现象，《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⑥，《孟子·万章上》“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⑦，《周礼·春官宗伯·大师》“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⑧，《穀梁传·哀公十三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甲骨文编》，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372—373 页。

②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35—637 页。

③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25 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86 页。

⑤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39 页。

⑥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532 页。

⑦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735 页。

⑧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789 页。

文身”^①，《礼记·表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②，等等，这在春秋以后的文献中屡屡可见。

后者是指事字符，于人的胸口处加以指事性的“心”符，与人的内在品德相关，表示“文德”之义，乃“忝”字的前身，常常用于表示美德、美称的谥号，尔后引申出“文心”“文人”“文治”“礼文”“文化”“文教”“文献”“文学”等义项。“文德”之说，历史悠远。卜辞中“文”作为人名，诸铭所见“武丁”“康祖丁”“武乙”“文武丁”“文武帝”“文武帝乙”等，皆为殷王庙号，故有谥法滥觞于殷商之说^③。殷人独尊文、武之谥号，其后周人因之，故金文中此一义项极为常见，结构变化也更为复杂。考之东周以前的文献，西周时期称先人为“文”“文祖”“文考”，广见于西周金文，如善鼎铭：“唯用绥福乎前文人，秉德恭纯。”又胡簋铭：“其格前文人，其频在帝廷陟降。”《尚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又《大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④此“前宁人”即“前文人”^⑤，“文”是泛指先祖的美称，并不限于是谁^⑥。由此可见，“文德”的观念在西周时候已经深入人心。所谓“文人”，就是文德之人，也就是有礼之人，“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⑦。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51页。

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40页。

③ 屈万里：《谥法滥觞于殷代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第219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4、200页。

⑤ 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卷一，商务印书馆1935年石印本。

⑥ 郭沫若：《金文丛考·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页。

⑦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考察“文”之本源意义两端，可以发现：由外在“错画”文饰含义，引申为藻饰、章采、仪式、声容以及《礼》《乐》《诗》《书》等古代文献乃至文化传统中各种具体可感形式；由内在“文德”含义，演绎出德行、礼文、人文、文教、文章、文学、文物、文质等抽象范畴乃至文化传统内在精神品格。经由词义引申和词性转换，“文”之意义空间在内外两个维度不断展开，所指称的文化内涵日渐扩充，由此构成了早期思想文化的一系列核心范畴。

“文”义衍生

文德、文武 “文德”乃“文”字基源意义之一，甲骨文的“文”字中加指事符号以充实之，至西周彝铭中“文”则清楚地加以“心”字成分，多指源于内的个体品德修养。金文中习见的“正德”“懿德”“孔德”“介德”“元德”“明德”“哲德”，都是对品行高尚者的称谓，如《周颂·维天之命》有“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①，《国语·鲁语上》有“文王以文昭”^②，均指文王有懿德、纯德，故谥“文”，所谓“文王之德”遂被视为古来有德者的最高境界。通过字形的演变，我们还可以看出，作为礼乐政治的核心命题，“文德”思想到西周已经成熟并完善起来，由此构成了传统时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源头。《礼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4页。

② 左丘明著，韦昭注：《国语》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6页。

记·大学》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在正其心”，内省其心，心正为德，正是发挥了此一思想。

“文德”与“文武”是相对的。古人对于“文”“武”的理解均与具体的德行有关，“文”主内心慈惠，“武”主外力暴戾。如《逸周书·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刚强直理曰武，威强睿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穷曰武。”^② 这些记载虽然已经不乏后人的想象，但是亦可以充分说明，古人重“文”“武”之德，尤其重视君王的政治品格。“文德”是三代圣贤政治的核心内容，如《大雅·江汉》有“矢其文德，洽此四国”^③，《论语·季氏》有“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④。古人提倡兼资文武、华实相符的完美人格，如《大雅·崧高》有“文武是宪”^⑤，《小雅·六月》有“文武吉甫，万邦为宪”^⑥，《鲁颂·泮水》有“允文允武”^⑦。据此，季镇淮先生认为“文”“武”自殷商以来就代表两个观念：“‘武’字表示人的一种事功（征伐），偏于政治的意义；‘文’字表示人的一种行为态度，偏于伦理的意义。”^⑧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73页。

② 黄怀信、张懋镠、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682页。

③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74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20页。

⑤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67页。

⑥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25页。

⑦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11页。

⑧ 季镇淮：《来之文录》，第24页。

春秋时代“文”义已经泛化，“文”之含义，无所不包，凡人生一切德行修养，皆可以统称为“文”，“文”可以相当于“德”“章”“学”等义，所谓“文德”“文章”“文学”的概念，就偏重在“德”“章”“学”之义，最典型的例子是《国语·周语下》记载单襄公告其子顷公，论晋孙谈之子周（即晋悼公）：“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韦昭注：“文者，德之总名也。”^①单襄公看到晋悼公具备敬、忠、信、仁等十一种德行，拿一个“文”来概括他，后来晋悼公果然复国了，证明单襄公没有看错，很有知人之明。对此，饶宗颐先生《孔门修辞学》认为：“所以‘文’字可说是一个典型的道德综合体，实在具有道德文化的全体意义。”^②礼乐教化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君子之文德品行、文雅气象，直到汉代人们仍然是这样认为的，如《说苑·修文》：“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则不能文。”^③又《礼记·乐记》：“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④逮至齐梁时代《文心雕龙·原道》开篇，即大为感叹：“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⑤刘勰秉承的亦是相同的路数。

伴随着“文德”意义内涵的不断扩充，“文德”开始与“文理”结合在一起。在古人看来，“文”不仅是德之总名，而且

① 左丘明著，韦昭注：《国语》卷三，第96页。

② 饶宗颐：《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81页。

③ 刘向著，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76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28页。

⑤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